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 史 資 料 存 稿 選 編

文 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葉選平



中國文史出版社

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文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文化史—
史料—中国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444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52.25 (全书总印张：1491.25 印张)
字 数：1207 千字 (全书总字数：34453 千字)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00 元(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文化

主编 李树人 方兆麟

副主编 张柱

编辑 仇志刚 冯宏友 刘琦 余秋明 陈健

张春生 杨志武 林放 周桂兰 柴寿安

康明 甄光俊

目 录

· 新 闻 ·

《大公报》在天津	汪松年 (1)
我所知道的《大公报》	曹世瑛 (12)
张季鸾胡政之和《大公报》研究部	杜文思 (19)
四进四出《大公报》	杜文思 (23)
国民党查封重庆《大公报》的真相	刘宗宽 (33)
陈彬和在《申报》的行径	顾晋琦 (35)
《苏报》与爱国学社	李泰荣 (37)
从陈屺怀办《天铎报》说到“竖三民报”	曹云鹏 (40)
成舍我与上海《立报》	张常人 (45)
我与成舍我和重庆《世界日报》	陈云阁 (50)
胡惠生与《文汇报》	吴志新 (58)
《江苏民报》内幕	计夕林 (65)
天津的《新天津报》	董孟豪 (70)
关于《金钢钻报》	郑逸梅 (76)
我所知道的《东南日报》	房宇园 严芝芳 (86)
《民主周刊》始末记	王丰年 (97)
龚德柏与《救国日报》	陈应庄 (103)
北京《民强报》内幕	田光远 (109)
忆《群强报》与民信通讯社	田光远 (112)
《时事新报》忆旧	张云雷 (117)
黄少谷和《扫荡报》	黄 伞 (119)
我和黄少谷及《扫荡报》	万枚子 (124)
南京《中央日报》回忆	陆 锏 (130)
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中央日报》	承纪云 (140)
杂忆南京《和平日报》	黄 伞 (150)
我在《新疆日报》的前前后后	张紫葛 (154)
熊少豪和汉文《京津泰晤士报》	涂培元 (165)

抗战时期的泰国《真话报》	余安奇 (171)
海外赤子的知音——《美洲华侨日报》	钟韶琴 (172)
日伪《新民报》	田光远 (174)
我所知道的敌伪《新民报》	赵怡平 (176)
敌伪《新民报》	贺逸文 (177)
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新闻报刊杂忆	杨 锋 (178)
忆北洋政府后期的北京新闻界	林 华 (180)
琐忆上海报界	陈冰白 (188)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国际宣传活动	米 蒲 (192)
沦陷时期北平的新闻业	王隐菊 (198)
抗战时期上海新闻界琐记	顾晋琦 (201)
解放前的南京新闻界	谢道武 (204)
回忆蒋经国发行的四家日报	李白江 (214)
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新闻业	牛青庵 (218)
解放前北京的著名新闻记者	华觉明 (225)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左东枢 (235)
回忆民族革命通讯社	郭紫垣 (242)

• 出 版 •

商务印书馆的推广活动	黄警顽 (246)
北京京华印书局 50 年	王之恕 宣 节 (249)
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	郑贞文 (256)
上海世界书局史忆	朱联保 (262)
回忆上海世界书局	朱联保 (287)
我在上海世界书局的编辑工作	朱翊新 (307)
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	刘廷枚 (315)
我与世界书局	胡山源 (327)
我在世界书局的编译活动	程小青 (329)
我与世界书局琐忆	俞鼎梅 (331)
在世界书局工作的日子	邱仲和 (335)
世界书局的发行工作回忆	刘季康 (337)
回忆世界书局北京分局	张弘任 (342)
杭州世界书局回忆	郑蔚文 (346)
世界书局在湖南省的经营	翁稚棠 (350)
世界书局重庆分局概况	易嘉炎 (355)

世界书局贵阳分局始末	易嘉炎 (356)
李石曾和世界书局的关系	李清悚 (358)
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争讼	宋云彬 (363)
漫忆民国旧派文艺期刊	郑逸梅 (366)

上海广学会概况	杭 海 (371)
琐谈清末以来私营图书出版业	张汉文 (375)
漫谈旧上海的图书出版业	朱联保 (379)
我与辛垦书店的关系及其活动的经过	陈 离 (387)
我所知道的北门书屋	朱定时 (394)
回忆抗战胜利前后的兄弟图书公司	吴 仲 (396)
概述国民党正中书局	黎子遗 (405)
正中书局创办的内幕	董巽观 (414)
有关正中书局的几点回忆	傅荣恩 (418)
忆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社	窦培恩 (422)
忆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和绥远分社	郭 敬 (426)
关于“七联处”	刘寒英 (430)

· 文化艺术 ·

清末北京“庚辛诗社”琐记	赵念君 (436)
旧上海小说家概况	韩 锋 (439)
忆田汉老师	吴似鸿 (453)
郁达夫在闽两年记	黄毓泌 (462)
我和郭沫若的通信	杨令德 (468)
新诗先行者杨骚生平散记	熊寒江 (471)
黎锦晖自述	黎锦晖 (474)
我塑孙中山先生雕像的回忆	吕纯甫 (477)
大革命时期的总政治部新剧团	李之骥 (480)
忆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	林焕平 魏华龄 (483)
内画烟壶大师——马少轩	王孟扬 (497)
博山的内画艺术	刘元武 (499)
华西大学与四川古文物	王云凡 (503)
忆北平艺社	宋北风 (507)
北京剧社始末	宋北风 (508)
张瑞芳石挥与“北平学生剧团”	党庆松 (510)
沦陷时期的上海“中华电影公司”	吕祖芬 (512)
沦陷时期日本电影在上海	张绍甫 (514)
西北电影公司成立始末	周士豪 (520)

“陈家党”夺取电影检查权经过 吴研因 (522)

清代乱弹戏在宫中的发展	朱家溍 (525)
长春科班	李洪春 (555)
忆父亲马连良的教诲	马崇仁 (564)
忆胞弟许翰英	许清溪 (566)
陕西易俗社成立经过	李约祉 (569)
易俗社发展经历	李约祉等 (573)
易俗社编辑、剧本简介	李约祉等 (602)
易俗社的教练	王绍猷 (617)
易俗社名演员	王绍猷 (621)
易俗社演员及其他	李约祉 (624)
旧北京京剧界的几个说一不二的人物	张文钧 (628)
汉剧在武汉	杨 铎 (635)
内蒙的地方剧——“二人台”	刘映元 (649)
旧社会曲艺界亲历琐记	关贞奎 (663)
我与西河大鼓	王艳芬 (668)
杂谈天津曲艺	周恩来 宋颂石 (676)

· 文化人物 ·

我的老师邵力子	黎碧石 (687)
缅怀邵力子老师	黄廷桂 (693)
邵力子事迹片断	陈于德 (697)
关于邵力子生平史事的两点订正	王永均 (702)
追忆徐悲鸿先生	邱行湘 (705)
怀念徐悲鸿老师	谭 勇 (711)
张大千先生二三事	韩希愈 (716)
张大千在浙江嘉善的往事	闵 三 (717)
略谈辜鸿铭	沈来秋 (720)
我所认识的陈香梅	江祖模 (727)
周建人与文化教育事业	谢德铣 (730)

· 体 育 ·

我的体育生涯	刘长春 (734)
30年代欧洲七国体育考察片断回忆	余永祚 (742)
回忆中央国术馆	赵荣林 (748)
解放前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邝亚英 (753)
清末民初摔跤运动轶闻	王孟扬 (757)

回忆南开五虎	唐宝堃	(765)
天津北宁足球队始末	田广武	(769)
山东平度县国术馆与“后方补充团”	孙同康	(774)
我的练武生涯回忆	郝鸿勋	(776)

· 卫 生 ·

回忆国民党政府卫生部	姚克方	(779)
国民党中央卫生研究机关琐忆	白由道	(784)
我国最早建立的卫生检验机构	孙序裳	(790)
刘瑞恒其人其事	姚克方	(793)
我所知道的刘瑞恒	白由道	(796)
刘瑞恒把持军医业务的经过	姚克方	(801)
南京中央医院 20 年	姚克方	(803)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记略	曾松涛	(806)
我为蒋介石、汪精卫、宋美龄治病经历	黄厚璕	(808)
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对待中医政策	姚克方	(811)
废止中医案抗争经过的回忆	秦伯未 张赞臣	(813)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西医问题的纷争	白由道	(819)
名中医施今墨	胡绍芳	(822)

· 新 闻 ·

《大公报》在天津

汪 松 年*

我于1928年参加天津《大公报》工作，至1940年退出。在此期间，出外则任其耳目，返社则参与谋权，故对该社发展经过颇有所知。现就记忆所及，把这一段史实写出，供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者参考。

一、“金字招牌”

天津《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创办人为清贵族英敛之，资本来自法国天主教会和当时驻津的法国领事馆及一些天主教徒。因英为天主教徒，得法籍传教士赏识，故予支持。

当时南北各报馆凡能获得办报自由的，大都赖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使清政府不敢干涉。故国人要想办报而不致坐牢，只有拉上外国关系或挂上外国招牌。

英敛之既无资本且为贵族中的维新派，在与维新派誓不两立的西太后秉政之下，而欲在报上鼓吹维新改革，要求西太后“撤帘归政”于光绪皇帝，是非有所凭借不敢一试的。英敛之在西太后自西安归来后，看到西太后怕外国人更过于怕维新派，凡有外国人撑腰之事，清政府无不另眼看待，任其为所欲为。于是，英敛之办的《大公报》遂在法国人庇护下诞生于世。其馆址择定在天津租界热闹中心梨栈（现滨江道），并于报名之下附以法文译名，以示与法人有关。英敛之以满族名士，抱怀才不遇之感，然知清廷积弱之源为官贪将骄，堕落腐败达于极点，若不仿效日、德、英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则清王朝之亡计日可待。英于《大公报》出版以后，便首发要求西太后“撤帘归政”的社论，继以揭发弊政，倡导维新改革，博得当时朝野的重视。

英敛之的《大公报》既为维护满族统治利益而办，在辛亥革命以后遂迷失方向，茫无目的，终于出倒于安福系官僚王郅隆。安福系失败，该报遂亦停刊。吴鼎昌所办新记《大公报》的发行号数，系继英敛之、王郅隆主办时的发行号数排下来的。新记《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兼创办人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名义上虽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股本五万元完全由吴鼎昌代表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准备金投入，故谓它由吴独资经营，更为确切。

1926年的某一天，胡、张来津与吴晤聚，闲步街头，行经《大公报》门首，见该

* 作者曾任《大公报》记者。

报的金字招牌高悬门额，而双门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向胡政之说：“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胡说：“你如果有意思，我当然愿意当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济汤’！”吴说：“钱不成问题。难得季鸾也在这里，咱们就凑合起来吧！”经过三人的进一步讨论，决定由吴筹资五万元，作为盘下《大公报》之用，并以余资为周转金。当时还商定，宁将全部资金赔完，也决不向外招收新股，以免因股东意见不同而影响事业发展。

此事决定后，遂由胡政之负责向王郅隆之子接洽收购该报事宜（胡曾任王郅隆主办时的总编辑）；招回原在该报工作的排、印工人，回社工作；抽调国闻通信社部分编采人员，充任办报班底；并由张季鸾负责筹备编辑部所需人员及资料，布置新闻网，聘约通信人员。在职务上，则推吴为社长，胡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为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以免蹈各报编、经两部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覆辙。胡、张二人合为一体，事业的经营管理均责无旁贷，故自始至终好合无间，并同为实现吴鼎昌的报业托拉斯计划而鞠躬尽瘁。

二、《大公报》的响亮口号

张季鸾、胡政之均为对新闻事业最感兴趣之人。二人于日本留学归国后，除极短时期做过不重要的官吏外，一直服务于新闻机构，并均有志于以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吴鼎昌以官僚起家，且为北洋军阀官僚资本的操持者，深知报纸是争夺政权的有力武器，既深得张、胡为助，有夙愿可偿之喜。《大公报》虽系吴鼎昌独资经营，但仍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允许张、胡二人以人力入股，使其可以取得与自己劳动相等的股票价值。这样，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便成为主宰《大公报》的三巨头。吴对张、胡二人所提出的办报意见，鼎力支持，且对用人行政从不干涉，听任张、胡放手施为。

新记《大公报》于创刊号上提出的办报宗旨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后定为“社训”，要求同人遵守）。这个口号是够响亮的，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系被主人用为敲门砖的。《大公报》以“四不主义”为口号，自然可以吸引读者，打开销路。加之《大公报》发行之初，在言论记事上以宣传革命进展为主，利用隐语电讯躲过检查，向读者报道一些事件真相，故随着革命军的进展，销路日广，信誉日高，遂成为全国性大报。

所谓“不党”，是指“不党同伐异，不为任何党派所利用”。所谓“立言，出于大公，见解容有偏颇，故只有公过，而无私失”。为保持《大公报》的“独立性”，三创办人相约：在创刊后的三年内，均不加入任何党派，不做政府官吏。过此以后，如参加政府工作，即应辞去《大公报》职务，以维持民营报纸的信誉。吴鼎昌于1935年被蒋介石拉去作实业部部长时，即在《大公报》上刊登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这对社内同事则有“属守社章”的示范作用。该报不但不准同人参加任何党派，即便是参加一般社交团体，亦在禁止之列。我担任外勤课主任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想拉我作该会的征支队长，为之征集新会友。胡政之知道后，即命令我婉言拒绝。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曾约曹谷冰担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曹为恪守社章，亦拒邀请。

张季鸾为使同人恪守社训中的“四不主义”，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四不主义”，即：“不锦上添花，不落井下石，不与人共利害，不参与别人的秘密”，以此作为立言记事的准绳。这对于外勤记者，尤有极大的约束力。

所谓“不卖”，是指不以金钱为交换。该报创办时，即决定宁把资本赔完，也决不添招新股，不拿别人的津贴维持。为使同人有以自养，故生活待遇高于各报，且用年薪制鼓励职工久于其事，因每工作一年虽不晋级，亦可多得年资薪收入，俾同人不致因子女增多家累而别有所图。

张、胡二人的月薪均为300元，因禁同事受别人资助，故对自己约束亦严。故张、胡二人常以所持《大公报》股票向吴作抵押借款，吴命悍然接受，从不略有资助。

胡在办《国闻周报》时，固不免赖津贴维持（如当时的外交部、安福系和奉系均按月付津贴），但自办《大公报》后，胡即恪守“不卖主义”，与各方断绝经济关系。

张季鸾体格消瘦，面色黑炭，故常被人误为“瘾君子”。张学良曾遣人持大包烟土为赠，竟遭到拒绝。张季鸾的又一项拒贿行为，则与我有关。我在该报任外勤记者，参加由陇海路约请的陕西实业考察团时，在通讯中揭发了陕西省当局对大灾以后的灾民犹作敲骨吸髓的榨取：即将灾民领到的赈济微资，竟用押打的方法逼令充作欠交的田赋交出。此事由《大公报》发表后，陕西当局大为不安，遂遣李志刚持万元支票来津访张为赠。张怒其无礼，转念此款亦取自陕西人民者，乃向李声明，《大公报》正为陕西募集赈款，就把这笔钱捐上吧。李虽大感难堪，也只有同意了事。李去后张对我说：“我们又对陕西灾民做了一件好事情。为了不为已甚，你笔下留情吧，我也认为应该罚而不打。”所以原议出版的《陕西实业考察记》就搁置未出。以此二例，足证当时《大公报》主人，确坚持“不卖主义”。

所谓“不私”，是指报纸为社会公器，同人不敢自私，愿与社会人士共用之。为此，该报特辟星期论文一栏，邀约足以代表某一阶层的人撰写论文，用署真名的方式（有文责自负用意）在社论地位刊出，每篇论文给40元巨额稿酬。此乃该报对上层人物所表示的“不私”。而对一般读者表示的不私，则有每周一次的社会服务版，广收各方来信，予以刊出，对提出的问题，或请托代办的事，则一一答复或代为办理。后因外地托办的事日多，遂特设代办部，专司其事。

所谓“不盲”，是指“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事理不明，是谓盲争；昧于大势，是谓盲动；同人不敏，不敢自附于盲”。换言之，即“稳健主义”也。故该报的主编，力求稳健，不作推波助澜的煽动，不作锦上添花的乱捧，也不作落井下石的乱砸。张季鸾曾说：“我们的报只对事不对人，故只为公过，而无私憾。”又说：“报纸是个不可抗拒的武器，——因非一般人所有，故不应以私的目的滥用此武器；滥用的结果，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该报以“稳健主义”博得当时统治阶级的好感，在“九一八”事变后，仍持沉默态度。“七七”事变前夕，当举国人民均在奔走呼号力促蒋政府奋起抗战之时，该报又视支持人民抗日运动为“推波助澜”，而默无表示，致被爱国人民以炸弹相赐。天津时代的《大公报》在人民中的威信，亦随一弹而敛。可见该报所宣称的“不党”、“不卖”既以不用为信条，则其独立自主的精神当然丧失；既不能独立自主，则“不私”、

“不盲”岂不是欺人之谈！

三、人才主义和《大公报》科班

张、胡二人为备尝办报甘苦的过来人，知道报纸是最富于挑战性的企业，欲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练兵储将，故人才主义、科班式培养，成为《大公报》后来发展的坚固基础。

张季鸾于解释人才主义、科班式培养时说：譬如唱戏，光是舞台好，行头好，还是不能叫座的；必须角色好才行。

《大公报》本此认识，对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始终不懈。出版初期，即由胡政之将国闻通讯社的编、采及业务人员大部调来，供报社使用。因为他们对编、采技术饶有经验，施之于《大公报》，自有轻车熟路、驰骋自如之效。

《大公报》在日本侵华步伐逐步扩大时，为使报纸不致在“突变”时中断出版，报馆必须预备两套班底，其中采访人员尤感不足而急待补充。于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许君远、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贡彝民、燕大新闻系助教蒋菘恩、北大助教张佛泉诸人，皆是以“方面大员”的资格，先后被聘请入社。

除上述新聘入社诸人外，其基干人员还有许萱伯、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杜协民、汪松年、徐铸成、孔昭恺、何毓昌、杨历樵、赵恩源、李天织、马季廉、王文彬、蒋逸霄（女）、张警吾、肖乾、艾秀峰等出任编辑、采访和撰述、译述工作；在沪社出版前夕，严仁颖、范长江、杨刚、徐盈诸人先后加入，遂为分地经营打下人事基础，故能在抗战八年中始终维持住分地出版的局面。

《大公报》主张自办科班，躬亲训练之法。它登报招收大、中学校毕业生，录取后使在社内见习若干时日，由张、胡分别作个人谈话，除了解各生的家庭情况、知识程度和个人志趣外，并向之解说《大公报》的章则制度和办报宗旨，并用“职业神圣”、“文章报国”等崇高理念鼓励其努力学习，早期成为品学兼优的职业记者。

报社对考取人员一律以练习生看待。至某部门见习时，即由该部负责人充导师，悉力培育，并随时将该生学习情况向张、胡汇报。当一般业务见习结束后，即分别调派至社内的外勤课和驻北平的办事处作采访新闻的练习。每日随同原有的外勤记者出外采访，或由主任指派至某新闻地点作单独采访。在初期练习中，大都被派往法院记录审判案件，或至警察机关打听突发的社会新闻，以考验其探索能力和访录能力。因此类新闻本属于可有可无之类，无关新闻采访的成功与失败；惟法院审判案件大都是牵涉多人，事迹复杂的，如能记叙翔实，包罗无遗，即可构成很好的报道文字。向警察打听新闻线索，借以追寻，是锻炼新闻嗅觉和跑腿的技能，故被当作新闻科班的初级课程。与此同时，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每年均有若干人愿来《大公报》实习，于毕业后也有些经校方介绍来社就业者，亦成为《大公报》人才来源之一。由于新闻工作是个劳动强度极大，并且是脑力和体力并用的工作，一个外勤记者，终日东奔西走，惶惶然惟恐漏掉消息，其辛勤紧张程度可知，故初尝滋味的人，每有知难而退者。

《大公报》在自办科班方面，虽未能实现其最初理想，但就仅有的成绩言，依然给

它带来了坚强的人事基础，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动力。张季鸾说过：“如果上海那些发财的报纸也能像我们这样来培养人才，中国的新闻事业，早已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了！”《大公报》培养出的办报人才，在作风和技术上，也确实给当时的新闻界带来建设性的影响，起过推进的作用。《大公报》对科班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要他们能够掌握到“写”、“跑”、“照”、“论”的技能和兼通编、经两部工作，成为经营新闻事业的全能人才。一大部分基干人员，也确被培养成办报能手，不仅使该报拥有办报的骨干力量，也使一些人在脱离该报后，仍各尽所能地为新闻事业做出贡献。如在抗战时期一度脱离该报的徐铸成，于日军侵占上海时与严宝礼创办的《文汇报》，便是借英商招牌为掩护，与敌人坚持斗争，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始方自动停刊；汪松年在西安受内迁工厂民族资本家委托，集股 2000 万元创办的《正报》，成为西北唯一大报；许君远被重庆《益世报》聘为主笔；蒋荫恩为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恢复了新闻学系；张琴南受聘充燕大新闻系教授并为成都《中央日报》写社论；范长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利用战地采访机会，把在战地活动的新闻记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不久即发展为全国性的组织。上述的这些人对新闻事业的贡献，或多或少是应归于《大公报》的。

四、“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

当 1926 年《大公报》出版前后，在该报行销所及的各地街头，都贴有该报的广告。开头写着“请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天津《大公报》”。这个头衔开始时确系自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当时全国各报来说，《大公报》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确是最新的。这种新的形式和内容，大受读者欢迎，其他各报亦先后仿效。

《大公报》的主办人张季鸾、胡政之均为日本留学生，对报业经营深有研究。他们除注重学习日本各大报的经验外，胡政之于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议和会议新闻后，还在欧洲漫游，参观研究了欧洲报纸的设施和优点，对《伦敦泰晤士报》尤为注意。通过学习和参观所得，他们对《大公报》出版初期使用盘入的老旧平版机（印刷）还不满一年，便改用每小时印出 5 万份的中型轮转机印刷。在九一八事变由日租界迁至法租界时，又由德国购入每小时印数 32 万张的高速大型轮转印刷机，配合该机的铸字、铸板部分亦全改为机械化操作。该报自改用高速机以后，物资方面已立于不败之地。

在该报发行满一万号时，为迎接一万号的社庆大典，报社规章、制度，交由许萱伯分类草成，经社务会议通过，作为同人共守的“法典”，成为当时各报中比较健全的新制度。

《大公报》的组织机构、分配形式、材料分配，大都取法于日本报纸。该报的编辑部组织系统为：总编辑、副总编辑；编辑总务下设：撰述课（社论、专论、各种评论）、译述课、外勤课（本埠和外地采访）、通讯课（指导通讯人员及编地方版新闻）、调查课（多种资料的调查、编辑、收购）、电务室（司电讯收录、翻译）、资料室（报纸剪贴、图片、传记、铜锌板分类保管）、校对室、驻平办事处、驻汉办事处、驻京

(南京)办事处。对报的内容和所欲争取的长期订户，则重视借鉴《泰晤士报》的经验。《泰晤士报》的言论有左右英国政府之力，其发行份数并不太多，因订户多为上中层人物，故影响极大。《大公报》亦以言论取重于当时中上层人物，成为最有权威的报纸。

以新闻排于版面，置广告于后页，尤为《大公报》一反国内各报习惯的重大改革。因为报纸为出卖新闻的商品，理应以新闻为重，不应为广告费所诱。

关于版面编排则全师日本报纸成法，所用的铸字铜模亦大部购自日本。当时各报只有1至5号的老宋体字，《大公报》购自日本的铅字则由初号至7号，且均为新体，较老体为小，笔画疏朗、反更醒目。用作新闻标题的字，除与本文同类的老宋字外，更备有各号的仿宋体字、楷体字、长体字、方体字（即黑体字）和临刻出的各体特大字。每段消息的标题务使不同，不但引人注意，且有百卉争妍、群芳争艳之概。新体字体已各小于老体字1号，故同一版面中字数已大有增加，该报为容纳更多的字数，初则由每版8栏改为10栏，高速印机使用后，又改为12栏，并缩小夹缝以扩大版面，抽去行与行间的夹条，以增加更多的字数。由于字数和栏数增多，在编排上更易变化，使每条不同，各显特色。经此改革后，在量的方面已超过当时各报甚多。

在美化版面方面，采用了日本报纸信守不渝的观点，即“空白就是美”和“一画值万字”的作法。使栏与栏之间必有空白，文与文之间必有间隔，完全摆脱了受当时各报纸重用长行，全版甚少变化的呆板形式。所谓“一画值万字”，即指新闻照片能把文字不能表达的东西（如气氛、形势等抽象的东西）表达出来，与新闻联合刊出，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公报》记者多兼拍照，除刊登于新闻版外，每周还出画刊一次，以刊登自拍和外间投来的各类照片。

采用反映社会生活的写生画制作锌版刊出，亦为《大公报》首创。如赵望云的农村写生画，沈逸千的边疆生活写生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封建地主残酷剥削下农民贫困无望的生活，有人将其比喻为新的《郑侠流民图》。赵望云写生足迹遍华北，积稿颇多。冯玉祥因受蒋介石逼迫移居泰山时，曾约赵望云至泰山作画，其积存作品亦由冯出钱印刷出版。冯的用意，盖在借此画册揭露蒋政权维护封建地主在农村中所造成之罪恶也。沈逸千于抗战前即在西北和内蒙古作游行写生，抗战初期仍未离去。《大公报》曾将其部分作品制版登出，后因制版设备无法使用，始停止登载。赵、沈之作颇类今日的连环画，很受读者欢迎。

《大公报》的最大特色，是从不间断地刊发社论，且无一不系针对时事提出的意见，具有倡导舆论和对读者指出大局发展趋向的作用。对当时尚不能作为新闻发表的消息，也常由社论透露出来，及至事态发展适为社论所言，读者遂认为该报言论有力，这实则得力于参考消息，事先预知当局的活动情形，据以判断其结果，故每“幸而言中”。因此，该报特别重视参考消息。三巨头交游既广，凡所欲知几无不获知；派至各地的外勤人员，也无不负责搜集参考消息，与通讯稿同时寄回。不及写寄的消息则译成电码，用长途电话告知。该报北平、汉口、南京的办事处，均充分利用电话传递消息；为避免别人窃听，均译成电码传递，既省时间又易保密。南京、上海间还用专机专人，意在避免发话与听话者因耳音不熟而听错。

《大公报》的社论，在天津时代由吴、张、胡三人执笔，以张所写为多，胡次之，吴又次之。文章虽出自三人之手，而风格则一，不但社外人无法辨识，即使社内人也不易发现异点。

在吴鼎昌投靠蒋介石以后，该报社论曾由陈豹隐代写一部分。陈亦日本留学生，专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经济学十讲》和《资本论》第一章等若干著作和译作出版，并为托派分子，被蒋特监视。陈虽在大学任教，而东藏西躲，居无定所。因此，陈的文章均由我亲自往取，盖恐信差泄露秘密也。

该报的另一特色，为特派记者的通讯与专电。凡属举国瞩目的重大事件发生，该报无不特派记者至出事地方采访，除将事态发展过程中的逐日演变以专电报道外，并将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形写成通讯。

长篇通讯除时事记载外，其他的考察记性质的连载作品，亦多有参考价值。如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除在报上刊登外，均另印成书，供读者保存参考。《苏俄视察记》为当时仅有的全面介绍苏联自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的专著。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反苏反共，对苏联消息严加封锁，故我国人民无从获知伟大邻邦的真相，所以曹著一出，大受进步人士欢迎。

范长江（原名希天）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应当时社会需要而作的。范当时尚非《大公报》正式人员，仅有投稿关系。他回四川以前，为北京大学学生。在日军侵入热河时，曾代表北平学生至热慰劳抗日军队，返平后以其见闻向《大公报》投稿，遂被聘为通讯员。因在北平受日本宪兵团注意，恐遭迫害，拟返四川暂避。为旅行方便计，范请报社给予旅行记者名义，采访所得，即寄报社发表。报社当局虽知范与中共有关，为延揽人计，仍允其所请。我曾继范之后入川，沿途获知范活动情形，虽属初入报界之人，其能力实不下于老手。

当时红军北上抗日，为举国关注的大事。如何始能不入蒋介石预设的陷阱，选何途径始能平安到达抗日前线，均为爱国人士亟欲获悉者。范长江所写的通讯，部分地答复了上述问题，故《大公报》特设专栏，用特大的标题刊出，且将长江二字置于标题之下，借以介绍于社会（按该报记者长篇通讯中才准署笔名于文尾，将长江署名以大字排于标题之下，意在助范成名，以报其冒险工作之劳）。长江以报告文学写法所写的通讯，在《大公报》上亦属别开生面之作。

我在该报天津时代任采访专责，足迹踏遍南北各省，故所写的通讯独多。其中半为新闻报道，半为记述之作。我的战地通讯中，有一篇《太行山隘七勇士》，被《复旦文摘》月刊选为1930年战地通讯佳作选的第一篇（共选十篇），抗战胜利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部审定中学语文教科书选用。亦足见《大公报》对宣传爱国主义，记录抗战史实，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由《大公报》首创并被各报先后采用的专栏文字，也是该报的特色之一。专栏文字大都系针对当时发生的国内的重大事件向读者提供的参考资料。外国报纸经常采用专栏作家的文章，专栏作家有时也被称为“观察家”，是善观政治风云，预测大局变化的，故能及时向读者提供参考资料。《大公报》专栏文字，大部分系由外国报上译来，其余部分则由社内外对某项问题有研究的作者写成。如由王芸生撰辑以《六十年来中